

西

方

漢學

界

的

中

國

文

論

研

究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West

巴蜀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 / 王曉路著. —成都:巴蜀書社, 2002.12

ISBN 7-80659-435-3

I . 西… II . 王… III . 詩歌—文學研究—中國
IV . 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2)第 106251 號

策劃編輯:李 蓓

責任編輯:李 蓓

封面設計:文小牛

西方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

王曉路 著

巴蜀書社出版發行 (成都鹽道街三號 郵編 610012)

總編室電話(028)866656816 發行科電話(028)86662019

四川省新華書店經銷 成都金龍印務有限責任公司印刷

開本 880×1230 1/32

印張 12.875

字數 280 千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600 冊

ISBN 7-80659-435-3/I·158

定價: 30.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工廠調換

電話號碼: 85651045 85651203

目 錄

自然、文字與西方的中國詩研究（代序）	張隆溪（1）
引言	(32)
第一章 德國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	(46)
第一節 德國漢學的歷史回顧	(46)
第二節 他者文化與文學魅力	(58)
2.1 異邦與幻像	(58)
2.2 想像與實用	(60)
第三節 理論之思：德國的中國文論研究	(73)
第二章 法國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	(90)
第一節 法國漢學的歷史回顧	(90)
第二節 中國古典文學的流傳與影響	(102)
第三節 法國漢學界的中國文論研究	(113)
3.1 程抱一的文論思想	(114)
3.2 侯思孟及其漢魏文學研究	(120)
3.3 桀溺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及其文論思想	(124)
3.4 相關學者的研究及其文論思想	(128)
3.5 于連及其《迂迴與進入》	(130)
第三章 中國文論在英語世界的研究概況	(136)
第一節 傳教士與漢學的奠基	(136)

第二節 經典譯介與文論研究.....	(141)
第三節 研究概況與成果縱覽.....	(154)
第四章 文化語境與文論研究.....	(192)
第一節 他者眼中的中國文論.....	(192)
第二節 不同文化語境中的理解與闡釋.....	(210)
2.1 “文”的困惑	(210)
2.2 詩歌與人格	(226)
2.3 文本的世界	(233)
2.4 闡釋之道	(245)
第五章 差異的認同與路徑的探尋.....	(264)
第一節 體系的建構.....	(264)
第二節 表述的差異.....	(280)
第三節 術語的界定.....	(298)
第四節 方法的切入與借鑒.....	(318)
結語：傾聽、理解與對話	
——西方文學及文化理論與中國文論建設的思考.....	(333)
附錄一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古代詩論	
.....	(美) 斯蒂文·范佐倫 (355)
附錄二 文化研究	(英) 安東尼·伊索普等 (363)
附錄三 學者譯名表.....	(377)
主要參考書目.....	(389)

CONTENTS

Preface: Nature、Writi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West	Zhang Longxi (1)
Introduction	(32)
Chapter I.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Germany	(46)
1. Historical Traces of German Sinology	(46)
2. Culture and Literature of the Other	(58)
1) The Exotic and Illusion	(58)
2) The Imagined and the Pragmatic	(60)
3.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Germany	(73)
Chapter II.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France	(90)
1. Historical Traces of French Sinology	(90)
2. Spread and Impac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102)
3.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France	(113)
1) François Chen's Study of the Theory	(114)
2) Donald Holzman's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in Han and Wei Dynasties	(120)
3) Jean Pierre Diény's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Lit-	

erature	(124)
4) Other Scholars' Studies Concerned	(128)
5) François Jullien and His <i>Lé Detour et L'accès</i>	
.....	(130)
Chapter III. Survey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tudied in the English Speaking World	(136)
1. The Missionaries and Foundation of Sinology ...	(136)
2.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the Classics and the Study of the Theory	(141)
3. General Survey of the Study	(154)
Chapter IV. Cultural Context and Study of Literary Theory	(192)
1.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in the Eyes of the Other	
.....	(192)
2.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s under Different Cultural Context	(210)
1) The Puzzling <i>Wen</i>	(210)
2) Poetry and Personality	(226)
3) The World of the Texts	(233)
4) The Way for Hermeneutics	(245)
Chapter V. The Identity of Differences and the Search of Ways	(264)
1. Construction of Systems	(264)
2. The Differences of Expressions	(280)
3.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s	(298)

4. In Search of Ways	(318)
Conclusion: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Dialogues – Thoughts Upon Western Literary and Cultural Theori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Ones	(333)

Appendix

1. Chinese Theory and Criticism; Premodern Theory of Poetry	Steven Van Zoern (355)
2. Cultural Studies	Antony Easthope et al (363)
3. List of Scholars in Translation	(377)
Bibliography	(389)

自然、文字與西方的中國詩研究

Nature、Writi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in the West
(代 序)

張隆溪

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
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內容提要 近代西方學術注重語言問題，在哲學和文化研究中亦有所謂語言學的轉向。西方漢學或中國研究也往往把中西思想文化的差異歸結到語言和思維的差異，影響其對中國語言、文字及文學的看法，而此類看法又反過來論證中西傳統之根本差別。作者簡略探討西方學者這種中西文化對立論之歷史淵源，討論西方本身對語言文字的傳統觀念，並由此質疑文化相對主義以及將中西語言文化相對立的理論和觀念。

Abstract Modern scholarship in the West has been marked by a “linguistic turn” in philosophical inquiry and cultural studies. In sinology or Chinese studies,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re often traced to som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in language and thinking, exerting a strong influence on the way Chinese language, writing, and literature are conceived in the West, which in turn consolidates the argument for the radical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Through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e

origin of such an East – West dichotomy and the discussion of traditional Western views on language and writing, especially the idea of the “Book of Nature”, the author puts in question such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 that dichotomizes Chinese and We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近代西方學術可以說特別注重語言問題。二十世紀從形式主義到結構主義再到後結構主義，語言學和符號學都起了重要作用，思想學術各個領域大多有所謂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認為語言絕不僅是表情達意的工具，而是與人的思維活動密切相關，密不可分^①。在不同文化和傳統的研究中，語言學都顯得十分重要，從人類學到社會政治理論，到處可以見到語言學轉向的影響，當然也影響到西方對中國語言文化的研究。早在十七、十八世紀，西方教會和思想界有一場關於中國思想文化的所謂禮儀之爭，涉及中西語言文化的差異問題^②。正如南木（George Minamiki）所說，禮儀之爭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皈依基督教的中國人是否還能參加祭孔祭祖等儀式，另一個則牽涉到“西方人如何把神和其他精神現實的概念翻譯成中文的問題”，也就是語言或術語問題^③。由此可見，西方有關中國文化和中國語言的看法，

^① 參見 Jürgen Habermas, “Hermeneutic and Analytic Philosophy. Two Complementary Versions of the Linguistic Turn?” in Anthony O’Hear (ed.), *German Philosophy since Ka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Richard M. Rorty (ed.), *The Linguistic Turn: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Metho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Cristina Lafont, *The Linguistic Turn in Hermeneutic Philosophy*, trans. José Med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② 羅光《教廷與中國使節史》（臺北：傳記文學，1969）記敘了禮儀之爭的歷史，尤其對康熙與羅馬教廷的關係討論甚詳。李天綱《中國禮儀之爭》（上海：上海古籍，1998）發掘國內外保存的有關漢語文獻，對羅光所著多有補充，是目前以中文論述禮儀之爭最有分量的著作。

^③ George Minamiki, *The Chinese Rites Controversy from Its Beginning to Modern Times* (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ix.

從一開始就是緊密關聯的。

十七、十八世紀那場爭論不僅在當時促進了西方對中國的瞭解，其中一些重要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是西方人談論東方文化一些基本觀念的來源，對西方漢學有深刻的影響。當時傳教士各派中反對利瑪竇（Matteo Ricci）和耶穌會“適應策略”的人，認為這種策略有失基督教教義的純潔，模糊了基督教與中國異教文化之間的根本差別。他們區別中西文化，認為天主、上帝等中文字不可能表達基督教神的精神觀念，從而建立起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對立。例如，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就說“中國人隱秘的哲學是純粹的物質主義”，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認識過不同於物質的精神實體”。另一個教士熊三拔（Sabatino de Ursis）也說：“中國人從未認識到不同於物質的精神實體。……所以他們也從未認識上帝、天使或理性的靈魂。”^① 法國漢學家謝和耐（Jacques Gernet）在他研究基督教在中國傳教史的著作中，也基本贊同這類看法。他批評利瑪竇和其他耶穌會教士在中國儒家經典裏尋找符合基督教觀念的成分，實在是誤解非西方文化，不知道儒家文化影響下的中國與基督教的西方完全不同。謝和耐進一步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之間的差異推到最根本的語言和思維方式的層次，認為“這不僅是不同知識傳統的差異，而且更是不同思想範疇和思維模式的差異”^②。“思維模式”是由語言表現出來的，所以中西文化的差異歸根到底便是中西語言上的差異，尤其可以歸結為中文在表達抽象概念以及超越性和精神性範疇的困難。謝和耐宣稱說：“全世界所有語言裏，中國語言格外特別，既沒有按照詞法來加以系統區分的語法範疇，也沒有任何東西來把動詞區別於形容詞，把副詞區別於補語，把主語區別於定語。”

① 引自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03.

② 同上，3頁。

他認為，中文缺少語法觀念正體現出中國思維模式缺乏超越和精神的範疇，所以中國哲學也相應缺少本體存在的觀念。他說：

此外，中文裏沒有一個字可以表達存在的意思，沒有任何詞彙可以傳達存在或本質的概念，而這在希臘文裏用名詞 *ousia* 或中性的 *to on* 就表達得很清楚。因此，存在的概念，那種超越現象而永恒不變的實在意義上的存在，也許在中國人就是比較難以構想的^①。

在《中國語言與外國思想》一文裏，另一位漢學家賴特 (Arthur Wright) 討論了傳教士在語言和翻譯方面遇到的困難，認為究其原因，乃是“在表達抽象概念和一般類別或性質這方面，中國人的資源相對貧乏。‘真理’ (Truth) 往往變成‘某一個真的事物’。‘人’ (Man) 往往被理解為一般而非抽象的‘人們’。‘希望’ (Hope) 也很難從以特定對象為目標的具體欲求中抽象出來”^②。謝和耐則認為基督教在中國不可能成功，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正可以歸結為中文在表達抽象概念上的困難，即“把希臘、拉丁或梵文這類有屈折變化的語言所形成的概念翻譯成中文時”，必不可免令人尷尬的失敗。謝和耐往往把中國與希臘思想相比較，作出二者彼此對立的結論。他認為不僅中文沒有語法，而且中國思維也缺少邏輯，因為“邏輯來自於希臘的邏各斯”^③。他最後得出結論，認為中西語言的對比證明，“印歐語言的結構幫助希臘世界——後來則幫助基督教的世界——建立起超

^① 引自 Jacques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A Conflict of Cultures*,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41.

^② Arthur F. Wright,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Foreign Ideas”, in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ed. Wri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p. 287.

^③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p. 239.

越性永恒現實的概念，而這和那僅僅由感官感知的、瞬息即逝的現實是完全不同的”^①。

對中國思維和語言的這類看法，在一些漢學著作裏頗為常見。如果中國語言確實不能通過符號和意象表達抽象概念，那由此就祇能得出一個結論，即中文祇能指向其語言符號所指的東西，祇能按照字面去理解其含義，而不可能超出字面而指向另一層意義，即抽象的、精神的和超越性的意義。這一基本預設產生了一些意義重大的結果，在西方形成了有關中國文學的一種獨特觀念，即認為中國文學與西方憑想像虛構出來的文學恰恰相反。要能超越，就必須先有一定的距離或差異，而所謂中國文學沒有超越性，其原因據說是從中國人的觀點看來，宇宙間一切自然現象都天衣無縫地連在一起，中國的文字和文學正是這宇宙的一個有機部分，而不是與之分隔開來的人為任意的創造，不是從外面隔着一定本體和審美的距離來模仿自然。漢學家史蒂芬·歐文(Stephen Owen, 又名宇文所安)對中國傳統中文學與現實世界之關係，正是抱這樣的觀點。他在討論中國詩和詩學理論的一本書裏說：“在這秩序井然的宇宙之中，為文學定位的術語是文。”^② 他把劉勰《文心雕龍》開篇一段話加以發揮，認為文或者“審美圖形”是自然萬物的最終實現或“顯現”，萬物都是通過文纔具有形體，變得可見而且可知。歐文說：

一切現象都有在“文”當中顯現的內在趨勢，而其顯現是為了變得可知、可感；祇有人心纔具有知與感的能力，而在那過程中，文乃是外在的形式。因此，文學是一個普遍顯現過程的最終體現，是其充分實現了的形

① Gernet,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Impact*, P. 244.

②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18.

式。……祇要視覺藝術僅僅模仿自然的“文”，它們就要受到柏拉圖的批判，認為藝術是二等（甚至三等）的現象。可是在這一表述中，文學並不真是模仿，而是一顯現過程的最後階段；作者也不是在“再現”外部世界，而不不過是世界自我實現過程最後階段的中介而已^①。

在歐文這一表述中，作為中國文字或文學的文並不是人類模仿自然的一種發明，因為文本身就是自然或宇宙的一部分。這樣一來，中國文學立即就和作為模仿和再現的西方文學區別開了，中國文學成了自然顯現過程的最終產物，成了萬物得以可知可見的形式，而且這整個過程純乎自然，就像水凝結為冰那樣。中國詩人作為“世界自我實現過程最後階段的中介”，就成了自然或世界在文或“審美圖形”中達於自我實現的手段或渠道。按歐文的說法，不僅文學作品無須詩人有意識的努力就可以自然形成，而且構成文學本文的基本成分即中國的文字，也“本身就是自然的”^②。西方詩人模仿造物者上帝，可以從無到有憑空創造出一個虛構的世界，中國詩人則祇是“參加到現存的自然中”，他們關注的不是虛構出美而不真的事物，而是“把內在的經驗或外在的感受真實地呈現出來”。因此，中國詩乃是一“非創造的世界”，中國詩人也都像孔子那樣“述而不作”^③。

余寶琳討論中國詩的意象，也把類似觀念作為立論的基礎。她認為西方文學是行動的模仿，中國文學則是“詩人對周圍世界直接反應的記錄，而且詩人自己就是那個世界不可分離的一部

^① Stephen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20.

^② 同上。

^③ 同上，84頁。

分”。中國詩人並不辨識“真的現實和具體現實之區別，或者具體現實和文學作品之區別，這類區別固然曾引起某些責難，但也使創造和虛構得以可能，使詩人有可能重複上天造物主的創造活動”^①。換言之，中國文化既沒有也無法識別“斷層”或“基本的、本體意義上的二元論”，由這樣一個傳統產生出來的詩，也就和現實世界完全緊密相聯，毫無間隙。然而中國詩雖說不受柏拉圖式的批判，不會被指責為與真理隔了三層，但同時也不能不承認自己沒有創造力，沒有虛構和想像的經營。

比喻和虛構是西方文學的基本特點，而一旦認為中國傳統完全是一元的，語言和語言所指涉的東西完全不可分，那麼中國文學裏也就不可能有比喻和虛構。如果中國語言或者文本身就是自然，中國詩人又怎麼能創作出虛構的、不真實的、與自然保持一定距離的作品呢？以這種“一元論”的觀點看來，中國詩祇是對現實世界的“直接反應”，其意義祇能指向當時當地，而不能指向任何超越性的、富有寓意的“其他東西”。歐文由此提出有關中國文學的一系列“命題”，其中首要的一條便是：

中國文學傳統往往不把一首詩看成是虛構的，它的陳述也被認為是完全真實的。詩的意義不通過比喻表達，即文本語言不指向超越字面的其他東西。相反，展現在詩人面前的是一個經驗的世界，而他所做的就是把它顯現出來^②。

這樣的命題對具體的文學批評頗能產生引導作用，歐文就以

^① Pauline R. Yu, *The Reading of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35.

^②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34 頁。歐文在堅持中國詩歌之非虛構性的同時，也承認在某些下屬的分類中，尤其在樂府詩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比喻性或虛構性。見 53 頁及 292–293 頁一段長注。

此為基礎，對比西方讀者閱讀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一首詩和中國讀者讀一首杜詩的感受，認為他們對詩歌體裁本身就有根本不同的預設。不管華茲華斯如何具體描繪他在 1802 年 9 月 3 日黎明時分，在威斯敏斯特橋上看到的倫敦景色，但他所寫是否真是他在那特定時間地點所見的實景，却並不重要。歐文說“詩的語言並不指向歷史現實中那個有無窮具體性的倫敦”，而是“引我們到別的某種東西，曉示某種意義，而泰晤士河上究竟有幾條船與這些意義是完全不相干的”^①。西方詩人關心的不是歷史的具體性，而是超越歷史之外的普遍意義，西方讀者身受同樣的教化，也把詩歌看成一種虛構，於是詩中的倫敦與真實歷史中的倫敦，就完全是不同的東西。再看杜甫的《旅夜書懷》詩：“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在歐文看來，這樣的詩“並非虛構，這是記敘在某一歷史時刻中的經歷，是一種獨特的事實陳述，記錄一個人的意識如何與現實世界相遇，又如何對之作出理解與反應”^②。歐文通過以上例子想要證明，中國與西方傳統的文化差異最終表現為一系列的二元對立：西方虛構，中國真實；西方具創造性，中國具自然性；西方關注普遍性，中國關注具體性；西方有比喻、超越的意義，中國有字面、歷史的意義，如此等等。這種對文化差異的強調不能不使人想起十七世紀時利瑪竇與其在天主教會中對手的爭論，儘管現在的歷史環境和強調文化差異的動機與當時已經全然不同。在十七世紀有關宗教禮儀的爭辯中，堅持教義純潔的正統派認定中國人為異教徒，所以中國語言不可能表達西方啓示宗教中上帝及神聖

^① Owen, *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 Omen of the World*, 34 頁。歐文在堅持中國詩歌之非虛構性的同時，也承認在某些下屬的分類中，尤其在樂府詩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比喻性或虛構性。見 53 頁及 292–293 頁一段長注。14 頁。

^② 同上，15 頁。

超越性的觀念；但現代強調東西文化差異的人，却往往把他們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視為獨特，加以珍視。但無論是歷史上的宗教禮儀之爭還是今天的文化差異說，其立論基礎都是一系列的二元對立：自然對文明、具體對普遍、具象對抽象等等。正如對中西比較頗有研究的美國學者蘇源熙（Haun Saussy）所言，這些二元對立無非是“始自傳教士時代歐洲漢學所爭執的一個老問題在現代新的翻版，是把那種爭執翻譯成了文學批評的語言而已”^①。當年那些天主教正統派為了突出文化差異，曾設立過類似的二元對立，他們似乎早已經“預示了我們在前面所見這些文學評論的方法和術語”^②。

把文即中國書寫文字視為“自然”，在西方乃是一根深蒂固的謬見，在傳教士時代歐洲漢學發端之時，這一謬見已初現端倪，可是現在漢學家們大多不願直面這一點。在現代使這謬見名聲廣遠者，乃是費諾羅薩（Ernest Fenollosa）《作為詩歌媒介的中國文字》那本小冊子，經過龐德（Ezra Pound）編輯出版，那小冊子的影響却並不小。此書出於一個外行人之手，有很多猜測的成分，但也極富創意。費諾羅薩在書中盛贊中國文字的具體物質性，說它可以喚起自然事物的意象，是一種圖畫式文字，因此作為詩歌媒介，中國文字比西方抽象的字母文字要優越得多。他還聲稱，用方塊漢字寫成的中國詩其實是“關於自然運作的速記式圖畫”，我們讀這種圖畫文字時，“似乎並不在數弄概念，而是在觀看事物如何實現自己的命運”^③。這種說法充分表達了那個由來已久的觀念，認為西方文字是抽象的，是在人的頭腦裏任意

① Haun Saussy,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6.

② 同上，39頁。

③ Ernest Fenollosa, *The Chinese Written Character as a Medium for Poetry*, ed. Ezra Pound (San Francisco: City Lights, 1969), pp. 8, 9.

創造的，而中國文字却是自然的，由事物本身構成。龐德以這富有創意的誤讀為基礎，建立起他的意象派詩學，費諾羅薩對中國文字的看法，也由此對現代英美詩歌發生了巨大影響。龐德一面讀費諾羅薩的論文，一面重譯其中的一些中國詩，他意識到這種中國文字觀隱含了一種全新的詩學方法。正如拉斯洛·格芬所說，費諾羅薩的文章為一種新的美學，即龐德所謂意象法奠定了基礎，這方法就是“把表面上毫不相關的具體事物並列起來，由它們的相互關係暗示出思想觀念”^①。戴維·珀金斯更用短短幾句話，道出了費諾羅薩對龐德的影響：

看來中國文字從來是具體的。每一個字都是一個意象；一行字就是一連串的意象。龐德一定在想，他怎樣纔可能在英語中達到同樣的效果。一行中國詩無須句法的指引而直接展現意象。費諾羅薩在他的手稿《論中國文字》中指出，自然本身就無須乎語法或句法，因此可以說中國詩就像自然那樣進入人的頭腦。不管我們怎樣解釋其方法，中國詩無非是一連串的意象，而且去掉了平常用來連接或解釋這類意象那些比較抽象也比較缺乏生氣的語言成分，所以中國詩能給人迅捷、簡約和無窮的意味^②。

這段話強調的又是中國文字的具體性和自然性，稱贊它擺脫語法句法的抽象邏輯，達到完全自然的效果，而費諾羅薩和龐德認為，詩本來就正該如此。就中國文字究竟如何運作而言，費諾

^① Laszlo Gefin, *Ideogram: History of a Poetic Method*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2), p. 27.

^② David Perkins, *A History of Modern Poetry: From the 1890s to the High Modernist Mod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463.